

何绵山 邱守杰 主编

福建经济与文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建经济与文化/何绵山, 邱守杰主编. —北京: 中国
戏剧出版社, 1996. 9

ISBN 7-104-00790-3

I. 福… II. ①何… ②邱… III. ①地区经济-概况-中
国-福建②文化-中国-福建 IV. F12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5235 号

福建经济与文化 何绵山 邱守杰 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衡 水 市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202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104-00790-3/F · 1 定价: 19.50 元

序

何绵山

随着区域文化热的持续升温，闽文化的宝库正在被缓缓打开，闽文化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内涵，引起了愈来愈多人的关注和兴趣。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丰富性（也称“碎状性”或“多元性”），这是与其它区域文化不同的关键处。造成闽文化这一特点的原因有五：一是闽地既封闭又开放。一方面山区极为闭塞，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另一方面海港船只远航世界，常领风气之先。二是独特的地理环境。闽地濒海多山，江河纵横，山文化、水文化、海文化争奇斗艳。三是文化构成复杂。古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海外文化的冲击，宗教文化的传播、近邻文化的渗透、台湾文化的影响等，使闽地既是中原文化的聚宝盆，也是域外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汇点。四是历代文化的长期积淀。秦汉闽越文化、唐代漳州文化、五代闽国文化、宋代建州文化、宋元刺桐文化、明代月港文化、近代左海文化等，都曾各领风骚。五是各地都有自己特点的文化。闽北的理学文化、闽南的侨台文化、闽西的客家文化、闽东的畲族文化、闽中的侯官文化、莆仙的妈祖文化等，特点鲜明，交相辉映。

文化历来是与经济共生互动的。闽文化的特点，导致了福建经济的特点：一、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富甲天下，

有的地方却长期无法解决温饱。二、与海外、特别东南亚经济贸易频繁。无论造船业，冶炼业及其它手工业，都不同程度受到海外贸易的影响。三、长期与台湾互补。虽然时有衰微，但这种互补关系已成为割之不断的客观规律。四、寺院经济长盛不衰。福建为佛教大省，至今僧尼仍有一万余人，约占全国汉族地区僧尼总数四分之一，按比例为全国第一。从唐至近代，福建佛教从未衰亡过。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寺院经济在整个福建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比重。五、经济开发多样化。福建地狭人稠，山区资源、海洋资源丰富，适于耕种良田少，除了发展农业外还要开发山区的矿物资源、森林资源、竹木资源、水利资源及海洋资源，进行矿冶、制瓷、造纸、制茶等手工业生产。因此，种植业、手工业、渔业、海上贸易等形式互为补充，不可或缺。

研究福建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是把福建建设成现代化强省的重要课题，也是福建迈向 21 世纪所必需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所以在这方面做了些不自量力的尝试，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得到有关同行专家的兴趣和关注。我们恳切地希望能得到有关同行的批评和指正。

目 录

序 何绵山 (1)

第一章 闽文化概述 何绵山 (1)

- 一、闽文化的形成和特点 (1)
- 二、闽文化研究现状 (10)
- 三、闽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16)

第二章 闽文化与福建现代化 何绵山 (24)

- 一、开发利用闽地的物质文化资源 (25)
- 二、开发利用闽地的精神文化资源 (32)
- 三、建设海峡西岸文化走廊 (41)

第三章 福州市经济与文化 邱守杰 (46)

- 一、福州市概况 (46)
- 二、福州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概述 (50)
- 三、福州市当代经济与文化概况 (65)
- 四、进一步振兴福州市经济与文化 (73)

第四章 厦门市经济与文化 吴松青 (76)

- 一、厦门市概况 (76)
- 二、厦门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概述 (81)
- 三、厦门市当代经济与文化概况 (94)

四、进一步振兴厦门市经济与文化 (99)

第五章 漳州市经济与文化 何绵山 (104)

- 一、漳州市概况 (104)
- 二、漳州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概述 (107)
- 三、漳州市当代经济与文化概况 (115)
- 四、进一步振兴漳州市经济与文化 (118)

第六章 三明市经济与文化 吴斧平 (121)

- 一、三明市概况 (121)
- 二、三明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概述 (127)
- 三、三明市当代经济与文化概况 (131)
- 四、进一步振兴三明市经济与文化 (141)

第七章 莆田市经济与文化 ... 林惠中 郑光弦 (143)

- 一、莆田市概况 (143)
- 二、莆田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概述 (148)
- 三、莆田市当代经济与文化概况 (160)
- 四、进一步振兴莆田市经济与文化 (164)

第八章 龙岩地区经济与文化 何绵山 (169)

- 一、龙岩地区概况 (169)
- 二、龙岩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概述 (171)
- 三、龙岩地区当代经济与文化概况 (183)
- 四、进一步振兴龙岩地区经济与文化 (186)

第九章 宁德地区经济与文化 梁奕章 (190)

一、宁德地区概况.....	(190)
二、宁德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概述.....	(201)
三、宁德地区当代经济与文化概况.....	(206)
四、进一步振兴宁德地区经济与文化.....	(210)

第十章 泉州市经济与文化 邱守杰 (218)

一、泉州市概况.....	(218)
二、泉州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概述.....	(221)
三、泉州市当代经济与文化概况.....	(238)
四、进一步振兴泉州市经济与文化.....	(244)

第十一章 南平市经济与文化 黄建国 (247)

一、南平市概况.....	(247)
二、南平市经济与文化发展概述.....	(252)
三、南平市当代经济与文化概况.....	(262)
四、进一步振兴南平市经济与文化.....	(268)

编后记..... (274)

参考论著目录..... (275)

第一章 闽文化概述

何绵山

一、闽文化的形成和特点

闽文化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其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从总体上看，它的形成与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古越文化的遗风。古越族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福建的土著居民是古越族的一个分支，称为闽越人。虽然随着中原汉族人民南迁入闽，闽越人在福建各地主人地位逐渐被替代，但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却不同程度地被保存。比如福建闽越人图腾蛇，《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这里的“蛇种”就是“蛇族”，即信仰蛇神的氏族。“闽”字的造字是从虫，门声。“虫”字通“蛇”解，即家门供奉蛇的氏族。闽越人所以图腾蛇，是因为祖先生活在湿温的丘陵山区，溪谷江河纵横交错，许多蛇类繁衍滋生其中，对闽越人的生命和生产造成极大威胁。《太平广记》引《宣室志》云：“泉州之南，有山焉，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常为人患，人有误近，或马牛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之有年矣。”因此人们在近山的岩石上刻画蛇形以祈求神灵的保护，并建庙供奉，希望能借助于

祈祷来企求好的结果。这种崇拜沿续至今，到今天福建还有不少地方保留着蛇王庙，如闽西长汀县西门外的蛇王宫、长汀县平原里溪边的蛇腾寺、福清和莆田等地的蛇王庙等。平和县三平寺与漳浦县交界一带的村民，一直把蛇尊为“侍者公”，把蛇当作“神明”加以顶礼膜拜，蛇与人同床共寝和同室共处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南平樟湖板的崇蛇习俗至今还极为隆重，每年六月下旬村民四出捕蛇，七月七日那天组成浩浩荡荡的迎蛇队伍，将蛇送到蛇王庙前的闽江放生。福建武夷山一带闽越人的悬棺葬距今已有3400年的历史，但这些悬棺并不是每具均有骨骸，有些空棺是为同族死者准备的，这是因为血缘氏族社会的族葬要将同族葬于一处。这种葬俗至今在某些地方仍流行。如武夷山脉松溪县花桥乡狮子崖险峻陡峭，其山崖裂隙中有深达100多米的“万棺洞”，历代存放在那里的棺柩达百具，层层叠架在洞内，下层年代古远者已陆续腐朽，上层的棺柩则有些是当世放进的。

中原文化的传入。其传入方式主要以大量移民方式。中原汉族曾四次大规模进入福建，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八姓入闽。这八姓多为中州的簪缨世家，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为避永嘉之乱而携眷南逃，都带着自己的宗族、部曲、宾客等，大大增加了福建地方人口。第二次是唐代陈元光开发漳州，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于唐总章二年（669年）率府兵三千六百多人进入漳州，年仅十三岁的陈元光也随父进漳，二十一岁时承袭父职，定居漳州，并大力开发漳州，使漳州改变了昔日满目榛狉的荒凉状况，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迅速发展。第三次是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曾与其兄一起率中原人马五千余人入闽，定都福州，后被封为“闽王”。他为治理福建作出了卓越贡献，使福建在中原动乱之际成为东南的富裕之邦。第四次是北宋南迁。宋室南渡前后，北方百姓为避战乱，再次出现南迁浪潮，大批人扶老携幼入闽，使福建地方人口急增，除了这几次大规模入闽外，从永嘉之

乱前至明清，都有中原人士陆续入闽定居。早期这些入闽者大多为逃亡或流放者，后期多为驻闽将士、赴闽仕宦者、为避乱而投亲靠友者。唐五代时河南固始来投奔王审知的，多不胜数。这四次大移民和陆续进入的大量移民，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加快了福建的开发和进步。此外，名士南下和闽人北游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中原文化。从唐德宗常衮任福建观察使起至明清，大批中原名士或慕名前来投奔，或为闽地秀丽山水而至，或前来授课讲学，他们虽然没有在闽定居，有的在闽时间也并不长，却为闭塞的福建吹进了新鲜的空气，活跃启沃了闽地学术文化。宋南渡之后，大批北方名流蜂拥而至，一时成了风气。唐中期之后，闽人开始中进士第，由此纷纷北上，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他们宦游归里时带回了中原文化。还有不少闽人北上访学，也将中原文化带回闽地。如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都在北方中原一带，不少闽人投奔其门下，深受其影响。崇安人游酢、将乐人杨时亦受业于二程，曾有“立雪程门”的故事。他们返回闽地后大力传播理学，后被朱熹改造发扬为“闽学”。泉州人谭峭是唐五代的大哲学家，他到北方“经终南、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岳、迤逦游历名山”（南唐沈汾《续仙传》卷下）。谭峭提出以虚、气、化范畴为核心的哲学，为宋明理学家从不同方面所吸取和效法，成为唐宋哲学发展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

宗教文化的传播。四大宗教在福建极为兴盛，传播速度极快。佛教传入中国约在东汉初年，而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福州正处开发之际，已有了绍因寺佛寺。晋太康九年（288年），南安也有了延福寺。唐代马祖道一禅师入建阳，是闽地禅宗的开端。当时佛教宗派林立，主要有盛于北方的渐悟和盛于南方的顿悟两支，故有“南顿北渐”之说。唐中期因寺院经济与国家利益矛盾日深，皇帝发布诏令，废除佛教，当时全国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

约 26 万人之多。福建也有所波及，如莆田寺院被毁不少，“洎武宗乙丑（845 年）之否，邑之东有敬善寺，民并而居之；乾有玉涧寺，民亩而田之”（《黄御史集》卷五）。但福建毕竟远离政治中心，山高皇帝远，佛教一直很兴盛。“顿悟”到唐末能衍为五宗，与福建有极大的关系。如临济宗的始祖义玄是福清人黄檗希运的门徒，沩仰宗创始人沩山灵祐是长溪人，曹洞宗创立人曹山是莆田人，立云门宗的文偃、立法眼宗的文益均出于南安人义存门下。长乐人怀海运用中国儒家的宗法制度，改造印度式的佛教戒律，制订出一套适合中国禅宗特点的清规戒律，称《百丈清规》或《禅门规式》，使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丛林佛寺戒律的创始人。当时不少福建人撰写的佛教著作誉满佛林，如莆田释文矩的《博山经》，仙游释叔端的《宗镜边缘》，建州释慧海的《顿悟入道要门论》、南安释义存的《真觉语缘》等。王审知治闽时笃信佛教，在闽地建佛寺二百六十七座，由闽王发给文凭的出家僧尼，竟有三万多人，故有“山路逢人半是僧”之诗。宋元明清至近代，佛教在福建也始终没有衰竭过，如宋末元初，仅福州府统辖的各县，就有佛教寺庙一千五百座以上，这在全国来说也是罕见的。福建名僧不但常奉诏晋京，授经讲法，还常飘洋过海，如唐代泉州超功寺僧昙静，曾追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元代的明极、楚俊等曾赴日本讲经；明代漳州名僧觉海亦赴日本长崎传法，并在长崎建有漳州寺。道教传入福建的时间较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福建就有方士活动踪迹。传说古陆终氏第三子篯铿进雉羹于尧而封于彭城，号称彭祖，隐居于幔亭峰下，其长子彭武、次子彭夷同居此山，因名武夷山，武夷山洞被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十六洞天，称为“真升化玄天”，升华元化洞天真人刘少公为武夷山主。秦时，在武夷山修道的有崇安人潘遇、闽清人游三蓬，并在山中建“止止庵”宫观。西汉时，浦城子期山、福州九仙山、南平衍仙山等都有道士在修炼。唐代时

福建出现了道坛庙观和职业道士，福州著名的道士有张林、符契元等人。五代时，王审知敬重道士，不少道士握有大权。宋代福建道教发展很快，不少道士屡受朝廷赏赐，新建道观如雨后春笋，著名的如福州真庆观、延平元妙观、莆田元妙观、闽县崇禧观、沙县宣福观、松溪文昌观等。泉州清源山上巨型石刻李老君像，高约一丈五、六，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由此可看出当年道教的兴盛。宋元之际江西兴起净明忠孝道，注意符篆禁咒驱邪御瘟等道术，从事服炼斋醮、修仙度人，福建亦由此出现炼养，符篆两派，前者代表人物如泉州龙兴观道士吴崇岳、长汀人王中兴、崇安人杨万大等。后者代表人物如漳州天庆观道士邱允、沙县人谢祜、长汀人梁野等。到明代，道教被取消“天师”称号，福建出现正一道和全真道。清代因乾隆宣布黄教为国教，道教被认为是汉人的宗教，所以开始衰落，但在福建，民间祈祷斋醮之事及服饵丹道之术仍旧流行，并逐渐成为民间习俗。公元七世纪初在阿拉伯麦加城诞生的伊斯兰教，早在唐中叶就由航路传入泉州。宋元泉州跃为东方大港后，数以万计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云集泉州，使之成为我国最早的三个伊斯兰教区之一。不仅金、丁、马、铁、郭、葛、黄、夏、蒲等十多姓的穆斯林后裔在这里生息繁衍，还建造了极具伊斯兰教色彩的清真寺、安葬伊斯兰先贤的灵山圣墓等，并留下了许多刻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中文的墓碑铭文。泉州至今还保存有我国最早的伊斯兰建筑——清净寺。此外，元朝时还有不少伊斯兰教徒跟随西域金吉军队到邵武，因此邵武至今还保存早期的清真寺，并还有不少伊斯兰教徒。福建的伊斯兰教从属于人数最多的逊尼派，在教法上崇尚哈乃斐法律学派。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传教士进行的。明代时，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等在明大臣叶向高的支持下，到闽北传教，并向福安、闽县等地发展，前后达二十四年，建有教堂二十三所，艾儒略曾被称为“西来孔子”，誉为开福建第一人。明末，菲律宾教省派传教

士十一人抵厦门、福州，开创多明我会传教区，发展迅速，郑成功还曾聘传教士为老师。清康熙年间，以白伯多禄为首的一批传教士，深入泉州、兴化、福安等地传教，先后在福建成立圣多明我第三会。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不同派系的传教士在福建展开激烈的传教竞争，基督教建的教堂和学校、医院、救济机关，几乎遍及城乡各地。无论从传教和建教堂时间上看，还是从教派、教徒和教堂数量上看，福建都较早、也较多。除了以上四大宗教的影响外，福建的地方宗教也有很大的影响，最有名的是三一教。这是将儒、释、道本教合而为一的教派，由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年间福建莆田林兆恩创建的。林兆恩认为儒、释、道三为一体，但后世的继承者不懂其本源，妄分三教，越走越邪。倡三教合一的本质是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与道教的修持功夫及佛教的涅槃理论合而为一，三者缺一不可。所以他以为儒教为立本，道教为入门，佛教为极则。三一教在中国立足后，曾向外省扩展过，清代中末叶曾发展到台湾、新加坡一带。福建的民间宗教也颇为风盛，其中最著名的是天上圣母、临水夫人、保生大帝这三“神”。这三尊神原型都是人，后被逐渐演化为神，赋予类人而又超人的“神”力；再借以护佑人们自身。“天上圣母”也称为“妈祖海神”，原名林默，是五代闽都巡检林愿的第六女儿，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相传她逝世后经常显灵护佑过往船只，救助海难，因此被视为航海保护神。临水夫人也称为“临水奶”，原名陈靖姑，生于唐大历年（766年），相传她能救女界之难产，具有“护胎救产，催生保赤佑童”的神力，所以妇女临产时，必供临水夫人神像于家中。“保生大帝”也称“健康保护神”，原名吴卒，也称吴真人，生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以其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闻名于闽南一带，百姓凡有病痛都要求吴卒保佑。民间宗教虽带有区域性，但其因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持久不衰，对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外文化的冲击。福建东临大海，良港棋布，有占全国五分之一长的海岸线，因此早在南朝时代，就与海外有联系。海外文化的冲击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外商定居闽地、闽人越洋后归里等几个途径。早在五代王审知治闽时，福建与海外的商业贸易往来就比较广泛，东起新罗，中经南洋群岛，西至阿拉伯地区都与福建建立了初步的贸易关系。北宋时，泉州便成为国际贸易港，被称为“涨海声中万国商”，与三十六个岛国有贸易关系。福建商人由泉州出发前往海外，一般一年往返，远的两年往返，用五色缬绢和建本书籍，与海外交换所需之物。到了南宋和元代，泉州发展为世界第一商港，明代统治者厉行海禁二百年之久，但位于龙海的月港依然帆樯如栉，海外客商汇聚，成为全国最大的走私港。明隆庆元年取消海禁后，月港每年孟夏之后，数百艘商船远航四海。到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国际贸易更为繁荣。由于国际贸易的繁华，许多外商定居闽地。特别在宋元两代，数量极多的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欧洲人为世界贸易大港泉州所吸引，定居当地而不返，被人称为番客，娶本地妇女所生的孩子，叫做半南番。他们将本国的风俗民情信仰融汇在当地居民之中，日长天久，海外文化便与当地文化水乳交融地渗透在一起。与外商定居闽地一样，也有不少闽人定居海外，宋元之后，逐渐增多，几乎遍及日本、朝鲜和整个东南亚。明代数万闽人出海后“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明史·吕宋传》）。十七世纪前后，东南亚的福建华人已在五十万人以上，福建华侨和华裔约有五、六百万，仅次于广东。这些华侨大多与家乡保持程度不同的联系，并时时有不少人回故里探亲，带来了形态各异的海外文化。

闽文化的形成过程使闽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碎状性。闽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中原文化具有正统性、传承性、稳固性、辐射性，源于本地的正宗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征服、融解能力。闽文化缺乏一种征服力极强的正宗文化，因

此谁也征服不了谁，由此形成一种碎状割据的文化形态。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外来文化相继进入福建时间最长，甚至在福建还是土著民族时代就已开始，因此本地文化无法形成一种凝聚力。二是进入福建的文化成份极为复杂，五花八门，即使是中原文化，差异也很大。中原来闽人士中，既有文人学士，也有起于田间的王潮兄弟。何况除了这四种文化外，还有其它文化对福建文化的渗透。所以任何外来文化到了福建也无征服力可言。三是福建地势复杂，既被称为“东南山国”，又被称为“闽海雄风”。一方面山区极为闭塞，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另一方面海港船只远航世界，常领风气之先。交通的不便和文化的差异，都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的交流。

难融性。闽地民俗各异、风气相佐。比如莆田一直重视读书习儒为首要之事，故“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莆之科目，肇于唐、盛于宋，又盛于明，每科与试者，视闽居半”（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而与莆田相邻的福清却以贾为业，“福清背山面海，多潟卤，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多行贾于四方，以其财饶他邑”（何乔远《闽书》）。最典型的是闽语的复杂性。在全国八大汉语方言中，福建方言就占三种，如果加上省界交叉地区，仅福建境内流行的就有汉语七大方言，可以说是全国汉语方言的缩影。而其复杂性还在于同一方言区，如闽南方言区中的厦门话、龙岩话、大田话、尤溪话之间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县或乡内，竟没有一种统一的方言，甚至有的地方过一座山、一条河就不能通话。这种现象是全国罕见的。闽文化的难融性还表现在良莠共存。《宋史·地理志》曾称福建“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信鬼神祠，重浮屠之教。”一方面重教育，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一方面又信鬼神，不惜重金建寺。难融性使闽文化更加丰富绚丽。比如福建的戏曲不象其它省市那样，有一种为全省人民普遍接受的戏曲（如北京的京剧、江浙的越剧、安徽的黄梅戏、四川的川剧），

福建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戏，很难说哪一种戏最能代表福建，除流行于各城市的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芗剧这五大剧种外，还有二十多个大小剧种流行于各山区沿海，仅今日可查的地方剧目就多达一万五千多个，故有地方剧省之称。正是由于福建的地方剧难以互相交融，所以在莆仙戏、梨园戏和南曲中，始终保留着一些宋元南戏的剧目，一些古本和古曲在全国其它剧种中早已绝响，而唯独在福建可以听到它的遗音。

双向性。这种双向性是因福建地僻东南一隅，濒海多山因此既开放又封闭而造成的。武夷山的静穆清幽、刺桐港的富庶繁华孕育出福建文化的双向性：质朴务实又灵敏洒脱、尊重传统又勇于开拓、留恋乡土又热衷外出……。这种双向性可合可分，有很大的适应性和可塑性。

不平衡性。这种因山、海造成的不平衡比比皆是。在经济上，如闽东、闽西、闽北一些山区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连糊口都成问题；而另一些地区，如福清、晋江等却能领风气之先，往往在经济旋涡起于青萍之时就卷进去。特别一些海外文化特征较为明显的地方，如晋江陈埭镇的居民有不少是海外来泉州的伊斯兰生意人后代，他们商品意识极浓，沿绵至今。这种不平衡还表现在人才发展上。福建人才不是在各区域同步发展，杰出人物最早集中在闽北山区，如朱熹等；后又集中在闽南泉州等地，近代却几乎都崛起于福州的侯官和闽县，（这两个县于1912年合并为闽侯县，属福州。）侯官崛起的这些杰出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纾等，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翻译家、文学家等，都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没有这些人物，中国近代史也将黯然失色。在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弹丸之地，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崛起如此之多杰出人才，真是个奇迹。

二、闽文化研究现状

与其它区域文化研究相比，闽文化研究显然还较为沉寂，还不是那么热火，也没有形成某种阵势，但近年也有了很大的进展。这种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召开了各种与闽文化有关的研讨会，从不同方面对闽文化进行了研究，开掘了闽文化研究的深度，丰富了闽文化研究的领域。仅以 1992 年底至 1993 年为例，如 1992 年 10 月在安溪召开的“纪念李光地诞辰三百五十周年暨李光地学术讨论会”，从各个角度对李光地进行研究，涉及经学、文学、史学、艺术、政治、哲学等各个方面，对李光地做出了新的评价，会后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光地研究论文集》。1992 年 11 月，在惠安召开了“惠安民俗学术研讨会”，其中心议题是惠安民俗及其相关的闽台民俗的调查与研究，研讨内容涉及惠安民间信仰、惠东民俗、惠安百崎和郭厝回族习俗等。1993 年 5 月，在南平召开了“第二次空海学术讨论会”，会议对空海在福建的行踪、空海的书法艺术、空海入唐与中日文化交流、空海与真言密教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对这位与福建有着密切关系的弘法大师做了多方面的考证。1993 年 8 月，在福州召开了“福州话学术研讨会”，会上对福州话研究小组所著论文集《福州话研究》进行了交流，并就福州话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讨。1993 年 8 月，在福州、古田两地举行了“陈靖姑文化研讨会”，会上就陈靖姑信仰、陈靖姑传奇及怎样研究陈靖姑等进行了研讨和交流。1993 年 10 月，在福州召开了“榕树乡土文学研讨会”，会上就怎样以福州著名历史人物和其它历史题材为题材进行创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93 年 10 月，在将乐召开了“纪念杨时诞辰 940 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从不同角度对杨时廉政恤民、爱国重教等方面进行了探讨。1993 年 10 月，在武夷山